红色印记

红二十五军长征路上的“七仙女”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队伍中，有周东屏（原名周少兰）、戴觉敏、曾继兰、曹宗楷、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7名女红军战士，她们都是随军医院护士。打仗时，她们跟着部队向前冲，不顾个人安危；常把饭让给伤病员，缺粮时找野果、树皮掺米糠为战士们充饥；缺药时收集、购买药品或采集中草药为战士疗伤。因英勇抢救、热情护理，她们被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称为“七仙女”。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率领下实施战略转移，一出发就是急行军。11月17日，击退敌“追剿队”第五支队后，部队接近平汉铁路。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怕7名女同志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派医院政委苏焕清动员她们留在根据地，并发给每人8块大洋。

面对这一决定，她们攥着大洋，心情沉重，有人急哭了。年龄稍大的曾继兰说：“不行，我们不能留下，死也不离开红军，要随部队走。”向来胆大泼辣的周东屏把大洋往地上一甩，与军参谋长戴季英争理：“回去，回到哪里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难道还要重新去当童养媳吗？你没有排斥女同志参加革命的权力！”其他人也把大洋甩在地上上前讲理。戴季英解释说是对她们安全负责，她们原地一坐，谁也不动。

这时，副军长徐海东骑马过来。女红军知道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平易近人，便围上去诉说经过和决心：当红军、走革命路，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离开红军。徐海东了解情况后说：“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说罢。他把马鞭向前一指，“快追赶队伍去吧！”姑娘们破涕为笑。

部队出发后，为甩开敌人，每天急行军四五十千米，常夜间行动。7名女战士把绑腿解下来结成一条长带，互相牵引摸索前进。为防掉队，她们提前出发、最后到达宿营地，一天下来全身像散了架，仍坚持给伤病员送药、争做护理。军首长见她们身体弱、时而掉队，又动员她们离队，待形势好转后再接回。她们一致表示：“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是红军的鬼，坚决不走。”领导再次被感动，她们继续随部队前进。

1934年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开会，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占领东北坳口。红二十五军长途行军月余、转战千余里，已疲惫不堪，排哨大部分人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眼前才发现。全军从炊事员到军长立刻投入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反复冲杀20多次，终于转败为胜。此战毙敌300多人，红军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伤，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重伤。

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左眼下打进去、颈后穿出，他昏迷了四天四夜，护士周东屏一直守护在身旁。徐海东醒来问部队怎么样，周东屏含泪说：“首长可醒过来了，把人都快急死了！”知道他四天四夜滴水未沾，周东屏找来一碗面条一口口喂他。

独树镇、庾家河两场恶战后，一些伤病员因无药医治牺牲，7名女战士极为痛苦，强烈的责任心和战友情，促使她们同医院战友一起收集缴获药品，想办法买药品，乘空隙找偏方采草药。两个多月里，她们用盐水和自制高锰酸钾天天给伤病员消毒，有时边行军边把采来的树枝树根熬水清洗伤口，弥补药品不足，挽救了不少战友的生命。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国民党军连续两次派重兵“围剿”。红二十五军奋力反击，连战皆捷，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同时，派干部和战斗连队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医院随部队行动，7名女战士既要抢救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

她们编新歌、演新戏，医护宣传一肩挑。在庆祝解放大会上，她们演出节目，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青年参加红军。唱歌跳舞演新戏她们并不擅长，都是现学现演，但每次演出人山人海。红军未到时，地主散布谣言，强迫群众逃跑。女战士的宣传很快打破造谣欺骗，大批群众就回来了。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静宁县回族聚居的兴隆镇。部队事先开展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回族同胞拥护。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红军，几位女战士更受当地妇女优待，被拉到家里吃饭，亲如姐妹。她们还在医院院长钱信忠带领下，深入群众家中为病人治病，回族人民连声夸赞“红军好”。三天后部队离开时，男女老幼站满街道两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端着点心油馍子送行。

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的压力下，曾继兰、曹宗楷倒下，长眠在漫漫征途上。她俩的牺牲没有吓倒剩余5人，她们继续走在长征路上。

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甘边境黄土高原时发生严重粮荒，只得向当地群众购买土豆和作马饲料用的黑豆充饥。当地缺水，土豆就连皮带泥蒸熟吃。翻山越岭几天，许多战士饿得昏倒在路上。5名女战士以坚强意志战胜艰难困苦，于1935年9月15日随大部队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7名女护士大都不过十七八岁，最小的才十五六岁。周东屏7岁随母亲外出讨饭，13岁被以50块钱卖给人家作童养媳，是共产党和红军救了她，1932年不满16岁参加红军。戴觉敏很小就参加了红军，哥哥戴克敏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父亲戴雪舫是共产党员、列宁高等小学校长，在敌人空袭时为掩护学生转移牺牲。戴觉敏1932年春天参加红军，在箭厂河总医院当看护。

长征出发时，吴焕先叫供给部给她们一匹小马，以便驮行李、有病时换着骑。但她们很少骑马，凭两只脚，有的还是缠过足的“解放脚”，穿草鞋、扎绑腿，跟部队一起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谁也没有掉队。

在开创陕南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里，战斗频繁紧张，她们每天随军转战，救护伤员、照顾病员。徐宝珊重病，程子华、徐海东身负重伤，她们常随三副担架奔前跑后。每打下一座新县城乡镇，她们更忙：上街宣传演出、收购筹集药品、安置伤病人员，还参加群众工作，没收地主恶霸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军供给部曾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妇女衣物分给她们，她们谁也不穿，随手转送当地群众。

西征北上途中，从天水附近渡渭河时只搞到一条小木船。水流湍急，军领导决定让“七仙女”和几个重伤员乘船过河，其他人则攀着牵在河面上白布绳索，把武器弹药顶在头上徒涉。参谋长戴季英从两当县城请来照相师沿途拍摄，拍下了“七仙女”乘船过渭河的历史照片，这张照片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征途漫长坎坷，她们曾背着捆草作为坐垫，坐滑梯似的溜下满地泥泞的王母宫塬，也曾抓着骡马尾巴漂浮过山洪猛涨的泾河。在泾河岸边郑家沟，她们淌着眼泪为军政委吴焕先擦拭遗体……沿途人烟稀少、无粮可筹，她们同样忍着饥饿、拖着疲惫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陕北，胜利完成长征。

戴觉敏、周东屏、余国清等到陕北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摘自王胜杰、赵庆领、徐晖著《红色先锋：红二十五军长征珍闻录》，未来出版社出版，内容有删减）



文史馆的故事

从两顿饭看到中国未来

□ 柯梦媛

漫步于省政协文史馆的二楼展厅，在聚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程的展墙上，有一幅照片引人注目，它记录的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的事迹。

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山河飘摇的艰难征程里，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是绕不开的名字。这位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实业家，以一生赤诚诠释着家国情怀。抗战爆发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他挺身而出，奔走呼号，牵头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凝聚起八百万南洋华侨的力量。数亿捐款、三千多名南侨机工、数百批战略物资，从南洋源源不断运往祖国，从街头小贩到富商巨贾，全体南洋华侨同仇敌忾，为救亡图存倾尽全力。

彼时的陈嘉庚，满心期盼着国民党能带领中国走出危局。可当他踏足重庆时，眼前的一幕幕景象，让他的爱国之心蒙上寒意。

时间回到1940年。蒋介石非常重视南洋慰问团，下令以最高规格款待。金碧辉煌的会所里，鱼翅燕窝罗列，法国红酒飘香，国民党大员们身着华服，觥筹交错间，无人提及前线的浴血奋战，无人在乎家国百姓的流离失所。陈嘉庚未曾想到，这场极尽奢靡的欢迎宴仅仅是开端，在随后的六十多天里，这样的宴请轮番上演，慰问团每天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

失望在一杯杯宴饮、一声声恭维中累积，最终化作陈嘉庚难以隐忍的愤慨。他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登罢宴声明：“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然而，这份恳切呼吁，在国民党的腐败奢靡面前，只换来一片死寂与漠视。

那时他并不了解共产党，听蒋介石一方提及也是多有诋毁，不过在见识到重庆的奢靡和腐败之后，陈嘉庚开始对这支队伍充满了疑惑和好奇。最终他决定北上延安，亲眼去看一看。

黄土高原上总是刮着凛冽的风，细碎的沙土散进风里，给眼前的景色蒙上一层朦胧的纱。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连一株小花都透着顽强不屈的底色。没有重庆的衣香鬓影、觥筹交错，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院子里接待了他。

这场“宴席”简陋得令人动容。一张坑坑洼洼的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当作桌布。每个人一碗咸饭，桌上摆着炒白菜和豆角等蔬菜，唯一的荤菜是一碗清炖鸡汤。毛主席指着饭菜笑着对陈嘉庚介绍，这些菜是自己种的，鸡汤是邻居大娘听说来了贵客，悄悄把她养的老母鸡杀了送来。

这碗清汤寡水的鸡汤，比重庆的山珍海味更打动人心。陈嘉庚尝着鸡汤，心中满是震撼，他看到的不仅是一顿简单的饭菜，更是共产党人的艰苦朴素，是军民同心的温暖。在延安的日子里，他见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战士们身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补着鞋底、擦着枪支，眼神里满是坚定。人人都心怀希望，人人都有信仰。陈嘉庚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真正能救中国的是这些扎根群众、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

两顿饭，照见了两支队伍天差地别的作风，更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命运。这不仅是陈嘉庚个人观念的转变，更成为他人生的重要拐点。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在华侨欢迎会上发表这一论断：“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坚定地将海外华侨的巨大力量转向支援真正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队伍，从此以满腔赤诚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同行，为祖国的独立与解放倾注全部心力。

这段跨越山河的“饭局往事”，早已沉淀为历史深处的注脚。作风见人心，实干定未来。从重庆的奢华宴饮到延安的朴素鸡汤，这顿饭的差别，恰是百年大党赢得民心、行稳致远的密码所在。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但那段历史所传递的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初心从未褪色。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始终指引着我们坚守初心使命，永葆清廉本色，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步履坚定地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人文风物

光泰门名称流变考

□ 张筱文

在龙首原东缘临近泸河之处，有一条明显高于周边区域的黄土梁，梁上有一座古老村落，名为广大门村。



广大门村的古老，是因这里曾是唐长安城禁苑东面二门之南门——光泰门所在地。至少自唐代起，这里便已得名光泰门，唐朝后诞生了光泰门村。时间推移，历史变迁，1949年后，流传一千多年的光泰门村名称演变成了广大门村。

光泰门是唐代长安城核心皇家苑囿——禁苑（隋代称大兴苑）东垣墙二大门之南门。据考证，禁苑占据唐都长安北部大片地区，北枕渭水，向西包揽了汉长安城，南接宫城，东抵泸河、灞河西岸，周回一百二十里，苑周有垣墙。东西各设二门，南北各设三门，光泰门正是东垣墙的南门。

光泰门近泸河、灞河汇流处，与唐代长安城漕运体系核心枢纽广运潭近在咫尺。考证认为，广运潭在“泸灞之会”，即泸河、灞河交会处，是唐代关中地区漕渠的终点，东可以接纳由漕渠行驶而来的漕粮船只，西可以转送都城供给，光泰门便是向西转送都城供给的最近通道。在广运潭和光泰门之间，还设有漕船装卸、储存米粮的“米仓”。

西北大学教授张永禄研究指出，光泰门与广运潭渡口形成水陆联运节点，具备双重交通功能；《陕西省志》记载，光泰门与泸河直线距离不足500米，掌控着禁苑东向出入通道。光泰门外东北侧三公里处即是汉灞桥所在，自秦汉以来就存在一条通往高陵、渭北的交通大道，光泰门外被认为是水陆交通汇集之处，是长安城东的交通要冲。

唐末，光泰门和整个禁苑体系随同唐王朝的覆灭走向圮废，光泰庙也遭遇了毁灭，史载：朱全忠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庙宇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而下。”光泰庙在此期间遭受拆除，不过后人很快又在其遗址之上重建庙堂、再塑金身。

在原禁苑光泰门所在地的黄土梁之上，再也没有了皇家禁苑制度对黎民百姓生活生产的禁制，并且还矗立着一座规模可观、香火旺盛的光泰庙，自然而然这里成为了人们定居生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选。

根据推测，唐王朝覆灭之后，陆续有百姓来到光泰庙周边生活定居，围庙形成聚落的现象在中国传统聚落中本就较为常见，加上这里黄土深厚、水源丰富、交通便捷，可谓是宜农宜商的风水宝地。

民间传说，光泰门村形成于明代隆庆年间，为“光大里”。至明代光泰庙周边已形成村落。据2024年考古文献，当地出土的明代地界碑已使用“光太村”的名称，印证了地名传承关系。

到了清代，嘉庆年间编修的《咸宁县志》将本村记载为“光太庙村”，属咸宁县午门社；民国时期，《长安咸宁两县续志》沿袭前志，仍记载为“光太庙村”，注释又称“光太门村”，属咸宁县午门仓（后划归长安县），彼时的光太庙村已是包括马家湾等四个自然村在内的大村。

1949年后，光太庙村正式改称广大门村，从南而北包括马家湾、堡子村、窑场子、什字街、后街五个自然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村。关于从光泰门到广大门的名称演化，《西安通览》概括记载，光泰门遗址在历史演变中形成“广大门”村落区域。

至于演化过程，笔者略作猜测：唐王朝覆灭后，李晟忠烈祠渐成庙宇，由于禁苑体系的毁废，临近光泰门区域良好的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人们陆续倚李晟庙而居，久而久之聚而成村，遂有了光泰庙村。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自然的洗礼、人口的迭代导致历史信息不断损耗、异化、失真。

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光泰门变为光泰庙，光泰庙成了广泰庙，广泰庙再成广太庙，广太庙又成光太庙，光太庙又成广大庙，广大庙又成广大门。“光”和“广”读音相近，“泰”和“太”读音相同，“太”和“大”意思相近、书写差异不大，加上村名和庙名的混用，几个名称在历史记载中交替出现，非常考验后人的辨识能力。

名称虽有差异，但传承关系非常明确：广大门村系由唐代光泰门演化而来，光泰门村所在区域拥有更为古老和丰富的历史。

光泰门村所在区域在秦、汉时期即为著名的“灞上”之西端，唐朝时作为禁苑东垣墙二门之南门，且地近广运潭，交通位置非常重要。宋以降，光泰门村作为交通冲要之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西安城和渭北之间的一条官马大道经行本村：大道全长125华里，由西安东廓门向东，经今石碑寨、光泰门，到新筑镇，再经漕渠村、耿镇，由耿镇渡过渭河后进入渭北。相应的，在光泰门村东北方向的泸河、灞河之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座被人们称作“古渡”的光泰庙桥（渡），《咸宁县志》记载：光泰门渡，入高陵路。《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光泰庙桥，在县治东北十二里光泰庙村灞水上。桥由光泰庙至宋家围墙，冬有夏无，人称古渡。每至冬、夏之初，由光泰庙、宋家围墙人民循例修折。

村庄名称历经演变，村庄历史历经变迁。

史料记载，光泰庙村在明清时期一度属于回汉杂居。据马长寿相关研究，光大门村曾出土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马氏祖茔碑，碑文记载光大门村属于回民聚居村落。清末动乱之中，光大门村于1862年至1865年成为回民和清军争夺的焦点，历经刀兵祸侵。

1866年，入陕捻军又与清军在光泰庙村附近展开激战，尤其是十里铺血战成为战役转折点，其主战场正是地势高亢、地处交通要冲的光泰庙村。

1918年，陕西靖国军左翼军与陈树藩部在光泰庙村附近多次发生激战。

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光泰门村（广大门村）千疮百孔，民生凋敝。清代以来，村民广种薄收艰苦求生。1949年后，全体村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人们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村庄实现飞跃式发展，村民生活蒸蒸日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泸水潺潺，如细语轻吟，在岁月的长河中悠然前行，诉说着不老的传说；龙首原如山不动，任江河代谢往来古今，凝视着亘古的相遇。城市化浪潮之下，广大门村早已拆迁殆尽，原住村民四散而居，期待尽早回迁新家园，和昔日守望相助的乡邻再度重逢。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印记》《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